长岛的阳光：陈晞

随便从哪里，钻入地下，一股尿臊味就升了起来。沿着那些阶梯走下去，墙壁上有斑斑污渍和各种涂鸦。冷不丁能看见毛色灰暗但体型硕大的老鼠，列车进站之前在闪亮的铁轨之间一闪而逝。

这是百年历史的纽约地铁，每天有数百万人靠它出行。不管是正儿八经的白领还是奇装异服的混混，中产阶级还是墨西哥移民，都坐在同一节车厢里。拥挤的高峰时段，他们不得不相互依偎。陈晞每天就在这些人中间，往返于中央车站附近的律所Jones Day和长岛的家。

从中央车站坐地铁到宾州火车站，然后换乘一列火车，大约十分钟后火车驶出隧道，阳光突如其来。这是长岛。每次靠站，车上的人都在变少，衣着却更整洁。美国式明亮开阔的生活，纽约城里看不到，这里才有。

陈晞已经过上了很多人都会羡慕的生活，体面的工作，长岛的大房子，免费的阳光。但这不是他当律师的目的，只是结果。就像他每小时500美金的律师费，只是律所的定价，不能涵盖他工作的价值。况且他的生活中，“也不只是工作和挣钱”。陈晞原先住在哈德逊河畔，从那里可以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尖顶。但他不喜欢，不喜欢工作在纽约又住在纽约，不喜欢加缪说的那种过剩的生活——“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马戏团在四个不同的场子里同时表演十个节目，于是你哪个都想看又一个也看不成”。

陈晞每天坐火车往返于中央车站的律所和长岛的家。从曼哈顿的腰包里掏钱，在长岛过美国式明亮开阔的生活，让人无比羡慕。

中央车站

长岛Manhasset车站

如果不做律师，陈晞会继续当一个科学家。作为在权威杂志发表过多篇第一作者论文的人，“科学家”这个称号用在他身上，丝毫没有英语里面头衔乱发的嫌疑。所以，他的前一份工作，就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Vertex制药公司里搞研发一份安静的工作。到Jones Day第一天就觉得很不一样。做科学家的时候，大家穿着打扮都很随意，有一说一。当了律师，当然还得有一说一，但适当的忽悠也很重要。虚张声势什么的招数，都得用上。

关于转行的原因，陈晞的标准说法是“觉得我也能干点别的”。这就是陈晞的语言风格，波澜不惊里的味道需要你去细想。生物医药科学家和律师，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的职业，在陈晞身上有一点是一致的——他们都在创造价值。有一种看法，即便在律师们当中也不乏拥趸：律师的工作不会创造新的价值，而只会消耗人们的金钱和精力。不管看起来如何神圣，法律行为都并未产生造福于人的新创造，它只是修补、纠正、复原。

但陈晞不这么看自己的工作。他主要的业务方向是生物制药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。保护知识产权的拥有者，实际上也是间接地促进医药科研的进展。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帮医药公司维权，Celgene, Genentech和 Roche这些全球知名的医药公司都在他的客户名单之上。在很多专利即将过期之前，仿制的药品就开始露面了。哪怕提前半年利润也很客观，一些中小公司就赚这个铤而走险的钱。可是，不管侵权的还是被侵的，双方在利用法律时都有很多的策略。某个案子，理都在我们这边，跟客户说一定要打到底，但他不愿意。因为就算赢了，对方赔偿的钱也未必比现在更多；有些案子一看就必输无疑，但客户就是铁了心要上。其实无非是消耗得对方不胜其烦，让他们多拿出一些好处。或者两个很大的公司棋逢对手，双方都请了科学家出身的专业律师，拉开阵势好像要大干一场，十有八九最后都和解了。

这几年涉及中国的商业窃密、专利侵犯方面的案例多起来了。实际上并不是美国公司真的要打官司，情况也并不一定对美方有利。他们就是要通过法律吓阻中国公司，一开始就让他们知难而退，别沾这块市场。

法律上的很多事情，并不看法理。经济意义比法律意义更重要。在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，律师是帮助医药公司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工具。律师得学会妥协。

作为一个前科学家和律师，陈晞很关注美国高院近期的一个典型案例。两个乳腺癌的基因专利，被大学实验室卖给了制药企业，由后者研发成了试剂，垄断了乳腺癌检测的市场。公众一般觉得这是不合理的，个人的基因怎么可以垄断呢？但陈晞认为公众多虑了。

很容易会认为，陈晞在替那些医药公司——他的客户们辩护，为了利益而置生物伦理于不顾。陈晞的理由是，必须让药厂去做这些研究，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医药的进展。如果现在过度限制药厂，将来没有人愿意创新，病人吃什么药呢？至于《猩球崛起》和《人兽杂交》那些电影里透露出的担心，他觉得有些好笑。起码在可预见的未来里，科研方面的进步不会那么巨大。科学毕竟还是科学，不是炼丹。

陈晞的办公桌上放了一盏老式台灯，有老上海的味道。但对在复旦生物系读书时待了四年的这个城市，他已经相当陌生了。淘来这个台灯，只是为了移情。不然，每天对着律所里沿着走道就密密麻麻排开来的文件柜，心情大概好不到哪里去。那么多的纸张和文字，要是全塞进脑子里，恐怕连爱因斯坦都会爆掉。

所以有时候他也会给律所完成一些公益的案子。也不是完全为了公益，“多跟各阶层的人接触”，换换脑子。由此，他见识到了因为丈夫对妻子说了句“回你的非洲去”而闹着要离婚的黑人夫妇，见识到了一对打离婚官司硬生生把两幢房子都打成了律师费的夫妻。

也不全是人间闹剧，当中不乏让人心酸的故事。一个离婚的女子来到了他的办公室，目的很简单，要求前夫把赡养费从每个月的80提高到150美元。这是一个独自带着三四个孩子的女人，她捡瓶子卖，几分钱一个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劳动技能。

过程很简单，举手之劳。陈晞通过法院向前夫的工作单位发了传票，那男人一看到传票就慌了，赶紧来见律师。那是一个来美国之前一直待在厄瓜多尔乡下的山民，他所谓的工作就是在建筑工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打零工。所以“看见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没钱”。最后的结果，是每个月赡养费提高到了120美元。这位建筑工人从此再也没有多余的钱请其他女人下馆子吃饭，并且还碰巧被前妻看到了。

这才是最难办的案子。几十美元的赡养费，比动辄涉及百万美元的医药公司官司还让人揪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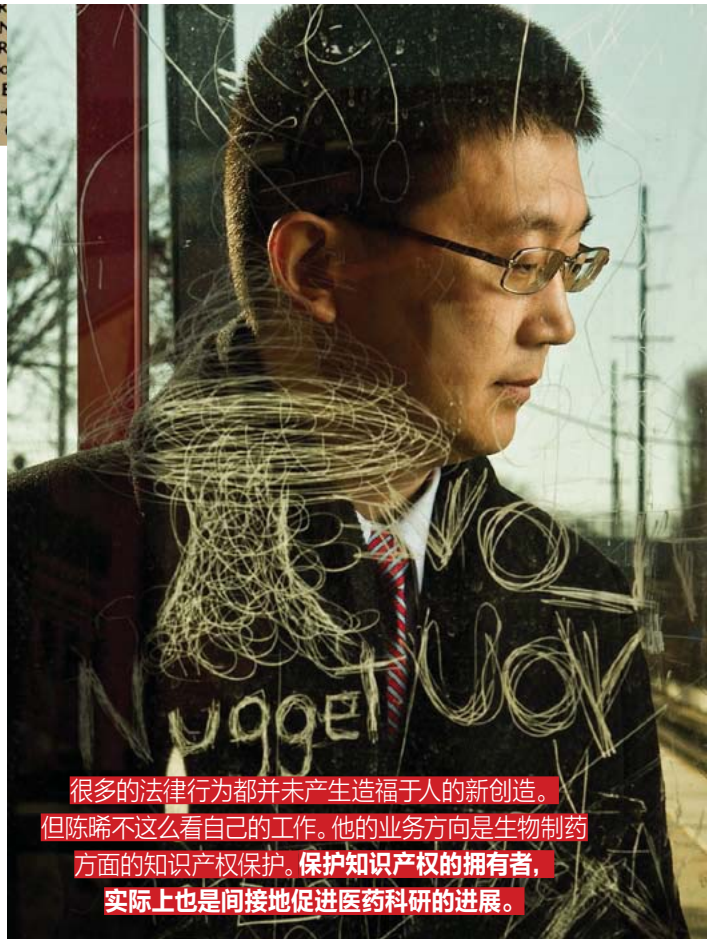
快到圣诞节的时候，律所为低收入家庭的人举办了一个活动，请大家吃点东西，分发一些礼物。陈晞也邀请了这个单亲母亲。她没来，也许是不愿意接受施舍。案子就这么结了，但陈晞接触到的、帮助过的那些人，若不是他出手相助永远也请不起律师的那些人，跟他依然是有鸿沟的。可能这就叫做阶级。

美国是赢家的美国，纽约是胜利者的纽约。在大牌律所工作的陈晞，对此很有体会。大律所有优势，动不动给你发个传票，要求你提供个材料。它有各种各样的资源，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，没等到审理，你就屈服了。有些胜之不武的味道。

陈晞还记得第一天到律所实习的情景。他的任务是去布鲁克林区的一家酒店里当卧底。他得混进一个传销组织的会议并且录音。万一被人家发现，可不太安全。据说以前有一个同事取证录音的时候，实在太紧张了，上厕所还开着录音笔，连自己如厕的声音都录进去了。

这样惊心动魄的事情后来就很少了，脏活累活总是新人的时候干得多。陈晞只要继续在这个律所待着，业务有精进，总有一天能成为合伙人。当然律师必须要洁身自好，律所不希望看到你身上哪怕有一点点道德瑕疵。对这方面陈晞令人放心。他待人接物谦和，一派君子之风。坐在长岛家中的餐桌边，儿子在楼上闹腾，院子里洒满阳光，陈晞语调平缓地跟我们聊天。

陈晞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词语，静水深流。他身上看不到那种昭然若揭的野心，也没有美国精英常见的夸夸其谈。但那肯定不会是中产阶级的满足。因为，一个能在纽约律师这个名利场中如鱼得水的人，当然不会这么简单。



很多的法律行为都并未产生造福于人的新创造。但陈晞不这么看自己的工作。他的业务方向是生物制药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。**保护知识产权的拥有者，实际上也是间接地促进医药科研的进展。**